

致新一代学人：期待超越吾辈

吴承学



“一代有一代之所长，一代亦有一代之局限。新一代学者的各种条件虽然比我们优越许多，但所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，反而比我们当年大得多。这是特定时代环境所产生的问题。易地而处，我们也难以避免。”

人生，中，师徒与父子是一种很奇特的关系。一方面关系当然亲密，另一方面，有出色的徒弟和孩子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叛逆意识和超越感。

人文领域里的一代新学人已悄然崛起。当年，欧阳修读到后生苏轼的文章之后慨叹道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！”我虽然没有欧阳修那样的身份和地位，但读年轻人学术成果时，往往也有类似“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”的感觉。

经常有年轻人问我，能不能超越我们这一代学人。我的回答是：应该超越，期待超越。

古人说，见过于师，仅堪传授；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一般来说，学生应该超越老师，这是常态，然并非铁律。我之所以说新一代学者应该超越我们，因为他们具备了比我们优越太多的条件。新一代学者所具备的优势，体现了时代的总体进步。

新一代学者的崛起具有特别的意义，它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出现新的常态，也意味着中国学术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。这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。

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一样，文学创作有“穷而后工”之说，而学术研究则需要长期平静而安宁的生活环境和较好的物质条件。新一代学者，生于改革开放，长于改革开放。三十多年来，社会长期稳定，没有过大的跌宕起伏。这是从 1949 年以来，中国社会发展最快的年代，这种高速发展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。而中国从 1979 年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，出生于城镇的新一代学者，基本是最早的独生子女，出身于农村非独生子女家庭的，往住也是家中掌上之宝，他们集各种关爱和期待于一身，是最早在物质条件方面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学人。

从学术研究的环境来看，新一代学人进入学术界，已是 21 世纪，中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硬件有了明显改善，而著名高校的教学科研条件与国外高校相比，差距已经大大缩小，有些甚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。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了比较规范的体制。他们的导师都受过现代学位制度完整、系统的教育，新一代学人从入门之初就对学术史与学术规范有所认识，并受过比较严格、系统的学术训练，所以很平顺而规范地进入学术研究。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，中国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极为广泛，年轻学者都有良好的外语能力，有海外交流经历，具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，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。这又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，新一代学者快速地掌握了网络与大数据方面的技术手段，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收集、交流和处理文献资料，这些都是前辈学人望尘莫及的。这还是一个自媒体时代，善于利用新的传播方式，也是新一代学者之所长。在自媒体平台上，每个人都可以及时地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，展开公平的讨论和交流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对传统的学术资历、地位、权威起了消解作用，对年轻学者学术声誉的获得与传播，也是极为有利的。新一代学者在物质与技术层面上，已完全具备超越我辈的能力与条件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一代学者的缺陷是明显的，总体而言是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——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动乱和物质、精神皆极度贫乏中度过。有幸进入大学后，高等教育才刚刚从僵化的体制和落后的水平慢慢地走出来。我曾有个比喻，学术研究如同画圆圈，圆规两脚的长短，决定圆的大小。同样，学者的研究能力决定其研究成就，对于文史研究者而言，须有“旧根底，新眼光”，这两者就如画圆的两脚。传统文史研究者须有特殊的知识结构；对于文、史、哲各学科，必须有较

好的基础；同时对于当代的各种学术思想、研究方法，也要加以吸收，兼收并蓄。坦率地说，我们这一代学者，除少数优秀学者之外，“旧根底”和“新眼光”皆有所欠缺。鉴于此，我们自然对新一代学者有更高期许。

我之所以说新一代学者应该超越吾辈，是比较审慎的说法。因为，老一代学者尽管先天、后天都存在明显不足，但又独具特色。他们所亲历的这个多世纪，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复杂多变的时代。他们经过十年动乱，多数人有过在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特殊经历，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命运。他们特别珍惜机会，有一种视学术为生命的执著追求。他们又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与参与者，对社会、对人生有一种比较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与体验，有洞察力与整体观，极富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，尤其有一种强烈的人文理想与人文关怀。这些因特殊际遇而形成的精神品质，对于人文学科而言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，这些绝对无法靠技术手段或书本知识得来。一代有一代之精神，后人未必叹赞，也无须摹拟，但它自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光彩。

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时候，导师黄海章教授曾以韩愈《答李翱书》中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，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。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晖”这段话勉励我。后来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，毕业时，导师王运熙先生也用此语勉励我。自古以来，名言佳句很多，为什么两位导师都不约而同地用韩愈的这段话来教导我呢？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？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后来渐渐领悟到，两位老师忠告我辈切忌“诱于势利，望其速成”，其实大有深意在焉。我们那个年代，倒是容易做到“无诱于势利”的，因为那时学术界就不存在什么能诱人的“势利”。当时有“穷教授，傻博士”“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”之类流行语，那些埋头搞学术的人，实在是不识时务的弱势或“弱智”群体。但我们这代人，被耽误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时间又是一去不返的，所以自觉不自觉的，不免有“求其速成”之心或之举，这也是制约我们这一代学人发展的一个原因。前人说，成名要趁早，但学术研究是没有暴发户的。快速成名往往等于慢性自杀。我们这代人中，曾有一夜暴得大名的学术明星，就像燃放烟花，瞬间灿烂，顷刻之间，烟消云散，很快就被人遗忘。这就是吾辈“望其速成”的教训。

到了今天，“无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利”这两句话，对于新一代学者来说，也未必就过时。

新一代学者中的多数人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一直到博士，都受到不间断的正规教育。完成了整套教育，也才二三十岁。现在不少人已经是教授，副教授了。本来，对于他们不应该存在“望其速成”的问题，他们完全可以按照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，从容不迫地走下去。不过，事实也不完全如此。我们的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，所以急切追求超常规的快速发展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在超出常态的激烈竞争和残酷的淘汰机制之下，个人若不速成，可能就有被淘汰之虞，这使许多年轻学者变得焦虑不安或者变得聪明精致，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。无为守贫贱，轲轲常苦辛。”这恐怕也是一些年轻人的心态。

其实，“望其速成”的根子就是“诱于势利”。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，“势利”二字，对于新一代学者的诱惑可能更大。钱锺书说：“大抵学问是荒山野老屋中，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。”这句话，现在听起来，好像是神诋。如果说，我们当年处于严重的“营养不良”状态，今天，新一代学者却处于“富营养化”的生态，名目繁多的科研、教学项目，各种级别的科研奖励、人才计划等，数不胜数，令人心地目眩。学术成果就是荣誉，就是地位，就是金钱。现在，已经有一套非常严密和严格的绩效考核体制，项目、论文、人才与评奖，各种会议成为学者生存的主要方式与评价标准，因此，许多年轻学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，都耗在这些无休无止的俗事杂务之中。但这并非他们所乐意的。我们那个年代，社会处于普遍穷困的状态，所以个人的安贫乐道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而现在的年轻学者处于举目繁华富贵之境，却要独自面对着票子、房子、孩子、职称等重压，要他们像传统学者那样独守清贫，视名利于敝屣，谈何容易！

汉代的司马相如写过一段话：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固常人之所异也。”我绝对相信新一代学者之中，“必有非常之人”，能建“非常之功”。真正能超越吾辈的，正是这些“非常之人”。

新一代学者，要超越吾辈，先要自我超越。一代有一代之所长，一代亦有一代之局限。这一代人，大多为独生子女之身，处安适裕如之境，浸淫于应试之学，应付乎考核之制，这就使一部分学者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、急功近利之心态与标准化思维。这是新一代学者可能的局限。他们的各种条件虽然比我们优越许多，但所面对的困难和承受的压力，反而比我们当年大得多。这是特定时代环境所产生的问题。易地而处，我们也难以避免。但新一代学者中必有一批“非常之人”能超越此局限，抗衡此压力；澄怀静虑，从容淡定。他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，宏大的学术格局，开阔的学术胸襟。他们不以一时之誉、一事之荣为重。他们最在乎的不是发表多少论著，而在于是否在某个领域有大的创见，是否自成一派、独树一帜；他们不汲汲于项目的大小、人才的等级，而在乎成果是否能传世，是否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。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一代学者中真正的“非常之人”。我相信，他们必能超越吾辈，而且将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中国学术。

（吴承学，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中山大学“逸仙学者”讲座教授。本文为吴承学教授在首届“文学青年学者研讨会”上的致辞，原刊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
想对老师说

迎来送往，为师之道的火种从不曾熄灭。优秀的老师，会在不经意的言传身教间照亮学生的求学为人之路。你想起那段校园中的青葱岁月，最难忘的，总是熠熠生辉的师生情谊。

面对老师，九零后有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。张俊生老师在管理学院有一批不分代际的小粉丝，他们和底下共同将张老师奉为“男神”。听到这个称号，张俊生老师笑着摇头否认，“没有没有，学生都开玩笑的。”

面对老师，九零后也有难以当面直言的心声。“我很喜欢老师的教学，也特别感激他，但平时总是说不出口。”如今的黄瑞芸，已经拿到了厦门大学会计系研究生生的保送名额，想到自己将前往老师曾就读过的学校继续深造，她充满了期待。“老师说，他在厦大读书的

那几年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，这让我觉得很振奋。”

在张俊生老师看来，教师这份职业很平实，不需要过多光环与渲染。“教学就是份良心活儿，教得不好，可能会耽误一批人。我也只是个很普通的老师，尽职而已。”

然而，当提起自己的导师时，张俊生老师眼睛突然发亮，神情与声线如学生提起他时一般轻快雀跃，“我的导师是个世间奇才，他不仅在财务学领域有深厚造诣，而且对历史、音乐、艺术都有很独到的见解。他做学问的严谨，真的让我们特别敬佩。他的人格魅力，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那一批研究生，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”

末了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们讲课的水平，不及他万分之一。”

启愤发悱 雕琢璞玉

——专访 2017 青年教师授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俊生老师

本报记者 林晓慧



张俊生

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会计学专业学术主任，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，中山大学“百人计划”引进人才。

七月的盛夏是告别的季节。毕业典礼上，张俊生老师穿着魔法长袍步入礼堂，与管理学院学生一路击掌，在这些瞬间，他常会被一种幸福击中，“哎呀，能获得学生的喜欢和认同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”

“会计”何为

“会计是一门相当有内涵的学科，有着很深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体系”

越靠近世俗生活且具有“工具”实用意义的学科，其历史传承的底蕴与人文意义也许越难以为外人所知，即使对身处其中的学习者而言，也很容易云里雾里地将自己的所学定义为“技能”。这一点，无疑影响了很多“会计人”的自我认知。

管理学院 14 级会计系的学生黄瑞芸笑着坦言，在进入大学之前，自己一直以为会计就像“电视剧里的账房先生，戴着很大的眼镜低头在那里敲算盘”。执教多年的张俊生老师心知，外界将会计等同于算账的刻板印象，会深刻影响学生对自己专业性质的定位。而学生能否理解会计这门学科运作的机理及独特之处，从某种意义上关乎专业层次的高低，“在中国会计的学生很多，但在人才层次上其实有很大差别。对于中大会计人来说，除了知道怎么做账以外，更要懂得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在张俊生老师看来，会计是一门相当有内涵的学科，“从本质上说，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一门语言，会计有着很深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体系。”因此，颠覆学生对会计学既有的偏颇观念，帮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建立起对自己专业的理解和认同，成为张俊生老师一贯贯穿于知识传授之上的信念。“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只是把会计当成一种职业技能，这种观念，我会在上课的时候，一点一点地给他们校正过来。”

师者，所以授业者也

“老师讲得好不好，其实学生最清楚”

改变观念的方法，便是让学生在知其然之余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懂得如何学以致用。说来轻巧，然而这并不容易，对于很多会计人来说，张老师讲授的高级财务会计课程的难度之高，已是“有口皆碑”。由于牵涉到很多复杂的抽象理论，需要不断与现实案例结合才能将知识变得鲜活，且更具实际意义；而在“有深度”之外，又要“有趣味”，才能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。“老师讲得好不好，其实学生是最清楚的，马虎不得”，张俊生老师说。

所以，在对学生的指导下，张俊生老师花了很多心思。让学生黄瑞芸最感动的是，为了增加师生互动的效果，张俊生老师将原来的两个班分成三个班，尽可能采用小班授课的方式。“这样老师要上一整天的课，他的工作负担会加重很多，而且要在南校和东校之间来回跑，看到老师那么累，我们也很心疼。”

然而，课堂上的张俊生老师总是神采飞扬，很多学生即使在毕业后，仍能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出张老师上课的场景：“你知道食指无名指的长短与财务报告激进性的关系吗”，“你知道男性高管的脸型对财务粉饰的可能影响吗”，这些张俊生老师信手拈来的提神剂，随即成了学生们最喜欢活学活用的宝贝。“上次听老师讲完，我一回家就拉着我爸爸妈妈的手指看长短，觉得还挺好玩的。”“轻松”“有干劲”“逗”“充实”，这些构成张老师课堂特质的所在，让学生更加感念老师的良苦用心。



那几年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，这让我觉得很振奋。”

在张俊生老师看来，教师这份职业很平实，不需要过多光环与渲染。“教学就是份良心活儿，教得不好，可能会耽误一批人。我也只是个很普通的老师，尽职而已。”

然而，当提起自己的导师时，张俊生老师眼睛突然发亮，神情与声线如学生提起他时一般轻快雀跃，“我的导师是个世间奇才，他不仅在财务学领域有深厚造诣，而且对历史、音乐、艺术都有很独到的见解。他做学问的严谨，真的让我们特别敬佩。他的人格魅力，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那一批研究生，这就是榜样的力量。”

末了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，“我们讲课的水平，不及他万分之一。”